

政协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東文史資料



第十輯



目 录

尉凤英今昔	包长生 王素梅 杨中旭(1)
和雷锋在一起的日子里	薛三元(15)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空军	鲍景云(23)
辛亥革命前后的张榕与袁金铠	惠德安(28)
大东百年风云轶事	鲍景云汇编(30)
解放初期的大东区区长边兆祥	武英杰(65)
大东区行政区划的形成与发展	鲍景云(80)
红旗插上东大营	任富兴 孟繁宗(91)
大东区旅游资源初探	马凤祥(98)
沈城禁毒禁娼与改造乞丐史略	齐守成(105)
忆曲坛作家里果与评书老将聂田胜	耿 瑛(116)
我与《四库全书》的一次结缘	吴在愔(122)
话说我的艺术生涯	花凤霞口述 赵凤鸣整理(125)
在文艺干部训练班的学习生活琐谈	刘振操(134)
大东区特种教育发展史略	郭作则(141)
奉海站张作霖铜像史话	王庆丰(157)
旧中国奉天小河沿之风情与习俗	刘洪儒(160)
《建国前沈阳大东区的寺、观、庵、塔、堂》一文的补充	张述翰 张述勋(166)
大东地区名胜古迹拾零(续) ...	刘振操 傅丽华 金玉华(182)
大东区的胡同掌故	齐守成(185)
大东历史上的“沈阳之最”	鲍景云(192)

尉凤英今昔

编者按：尉凤英是辽宁省抚顺人，1933年出生。1953年她进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从这时起至1965年，实现技术革新170项，其中较大的有58项；仅用434天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又用4个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她领导的“红专大队”实现技术革新707项。

1955年9月28日，她在北京中南海第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后，又先后12次受到伟人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她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1954年到1963年她当了近10年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她任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转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职，历时12年。

1977年，尉凤英在北京向中南海打报告要求回故乡辽宁，得到批准后，她来到新阳机器制造公司任副厂长，1983年被选为厂工会主席。就像一片归根的落叶，返璞归真，回到最熟悉她，她也最熟悉的人群里。

本辑组稿数篇，从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视角去回忆和展现尉凤英的过去和现在，使人们看到的尉凤英仍然是那么朴实无华，在烂漫的山花中依然发出阵阵幽香……。

尉凤英回忆几则

包长生(整理)

“功勋战车”立了功

1948年11月1日,大队的解放军从东边开进工厂,当时护厂委员会的工友们都直奔东门,大家边走边喊:“快走啊,解放军进厂了,迎接解放军,咱们解放了!”一传十,十传百,工厂东门两边站满了举着小红旗,衣衫破烂却欢呼雀跃的人群。我看着肩扛大枪,步伐整齐的解放军,心里羡慕极了,跟着大家使劲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些年轻力壮的工人,当场就报名参加了队伍,衣服也不换,马不停蹄地向市内冲去。我知道沈阳还没有解放,他们是去解放沈阳城。唉,我不是女人多好,也扛起枪跟着解放军一起解放沈阳。

望花岭上,战斗激烈。国民党207师埋伏在战壕里,哗哗打机枪,拼命顽抗。一时解放军战士倒下好几个,大家都急红了眼,硬要往上冲。一个解放军干部阻止了大家的盲动,他向刚参军的工人问了几句,立刻那几名工人和几位解放军向工厂跑回来。工厂护厂委员会的工友们知道望花岭受阻,立刻进厂,直奔战车部,他们有的修发动机,有的焊甲板,有的往战车内装弹药,连家属也进厂搬搬扛扛。一辆坦克修好了,可是,部队当时没有人会开。这

时几名工人师傅钻进坦克内，开起战车，轰隆隆，向望花岭冲去，后面大队的工人扛着从仓库里找出来的弹药也向望花岭冲去。顽抗的蒋匪军，一见坦克冲上来了，有的扔下枪就跑，有的抱着脑袋跪在战壕里等死，解放军势不可挡，蒋匪溃不成军。解放军大部队在坦克的轰隆隆声中一鼓作气，解放了沈阳，这一天是1948年11月2日。当时战车部修起的这辆坦克就是现在放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里的那辆“功勋战车”。

“咱们工人有力量”

沈阳解放后，军工厂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生产，制造枪炮弹药，支援前线，打到海南去，解放全中国。当时，原九〇兵工厂厂长陈修和（陈毅副总理的堂兄）等人抵制了国民党首脑人物“炸掉工厂，飞往台湾”的破坏计划，保护了大部分厂房和设备，使之回到人民的手中。就是这样，厂区内也荒草没膝，残墙断壁，弹坑累累，而且遍布没有爆炸的炮弹，这东西随时可能爆炸，十分危险。清理残弹是恢复生产的第一道难关。在清理工作时，有一个人头戴一顶狗皮帽子，一付棉手闷子背在身后，魁梧的身板外穿旧军装，国字脸、浓眉、大眼，他不多说话，只是每天很早就到没膝深的荒草中去找残弹。他身后跟一个背匣枪的小战士，周围是找残弹的工人，只要有人说：“这有一个。”他就立刻跑过去，挖出弹子，卸下引信，才将炮弹交给工人装上车推走。开始，工友们以为他是专干这一行的，都佩服他技高胆大，后来听小战士总是“首长，首长”地叫，才知道他就是后来的厂长余侠平同志。看到解放军

的大首长都身先士卒，工人的热情就更高了。在清理残弹的同时，工厂开展了“献纳器材（公物还家）”运动，工友们纷纷把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时期从厂里和机器上拿出的或卸下来的工具、材料献出来，工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充分显示出工人当家作主人的情怀。从此，“工人是工厂主人”这个信念就牢牢地扎在我的心中。生产全面恢复后，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安装机器，加速生产，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一直到全国解放。那时候，工人边在车床上干活，边在嘴里哼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人工作忙……，造出了枪炮送前方……，为什么？求解放……”越唱干活越来劲，常忘了吃饭，忘了下班。那时候老工人常将这些优良传统讲给新入厂的工人听，听得我们这些小青年也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就是在这种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人。

“抗美援朝立了大功”

正当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全国人民才开始新的生活，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被全国人民打败而龟缩台湾的蒋匪帮，也蠢蠢欲动。为了援助兄弟般的朝鲜人民，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人民同仇敌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赴朝作战。我们知道前方打仗，全靠后方支援，多生产炮弹就能多消灭美国鬼子。于是，在我厂掀起了生产高潮。全厂上下总动员，工人们夜以继日工作在机床旁，饿了咬口馒头，渴了喝口凉水，困

极了就趴在机床边打个盹，醒了再干，几天几夜不回家。工厂、车间领导开始还给工人鼓劲加油，送水送饭，后来见工人太累了，就往回劝大家。但是，工人们就是闷头干活，谁也不抬头。领导没有办法，就拉电闸，往家撵。工人前脚走，干部推上电闸也干起来，机床一响，工人又都跑回来，将干部推下机床，干了起来。领导没有办法就主动当好后勤。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厂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群策群力，仅短短三年，就研制出 10 余种新式武器。1950 年 10 月，《前进报》、《东北日报》载文：“志愿军使用的 90 兵工厂 3 分厂生产的反坦克火箭弹仅一个多月就击毁美军坦克 282 辆，多次打退美军坦克群的猖狂进攻。”为此工厂受到国家兵工总局的嘉奖，说我厂为“抗美援朝立了大功”；当时研制者和有功人员还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蚂蚁啃骨头”的奇迹

1958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沈阳工人用小机床生产大机器的消息，还配发了一篇标题十分形象的社论：《谁说蚂蚁不能啃骨头？》。同年 10 月 20 日，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又在沈阳召开现场会议，向全国推广这个经验，认定这是加速重型机械工业发展的好方法。这个闻名全国的“蚂蚁啃骨头”的经验，就是东北机器制造厂创造的。为了支援农业发展，1957 年底，东北机器制造厂在无技术图纸资料、无生产实践经验、无大型制造设备、无足够资金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肩负起试制我国第一台氮氢气体压缩机的重任。这是一种双列、卧式

六级压缩机,是生产合成氨化肥的主要设备,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其全套设备的总重量为180吨。当时,南京永利化肥厂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这种设备。东北机器制造厂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对机械设备进行精确测绘,画出图纸,带回了沈阳。然而,技术人员刚一研究,就意识到困难的巨大,工厂根本就没有能加工10多吨重部件的大型机床。面对困难,厂里组成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班子,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昼夜加班,连续作战,自制了7种13台专用机床,利用这些“小蚂蚁”似的机器,去啃那个硬骨头的大部件。先后加工出6个缸体、2个机身、1根主轴等1067种共6067个零件。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生产出我国第一台“红旗牌”2400马力氨氢气体压缩机,填补了我国氨肥生产设备的空白。1958年8月4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并表扬了进京报捷的工厂代表。东北机器制造厂创造的“蚂蚁啃骨头”的奇迹是振奋人心的,它不仅显示了一个兵器工业老厂、大厂的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也展示出沈阳工人开拓创新、顽强拼搏的精神境界,在沈阳乃至全国工业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往事的回忆

——尉凤英晚年生活采撷

王素梅

不能不说造化弄人。一个旧社会拽着寡母，拿着打狗棍沿街讨饭、捡煤核的贫苦女孩儿，后来竟平步青云，这在中国几千年政治历史中还鲜有先例。我们只能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选择了她。十多年来，曾经有过那般“辉煌”人生的尉凤英将自己裹的严严实实。如同一卷尘封已久的老画。她怎样看待自己的过去，又怎样面对未来，生活中的她每天都在想些啥，干些啥……这在与她走过共同岁月的人们心中成了一个待解的谜。

老照片可以翻拍复制，生命却不可以轮回

一次，我和高级记者蒋少武带着许多老照片去采访尉凤英。初见时，真的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再普通不过的老妇人，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尉凤英。她老了，不是说她的脸上平添多少皱纹，也不是那双流露真情的眼睛已现出疲惫，而是她那急匆匆向前倾斜的肩背与蹒跚的脚步现出的不协调和随心所欲的跳跃式思路。只有朴实依然，热情依然，爽快依然。

尉凤英的家就在北三台子一幢普通职工宿舍楼里。三室的房子，有不到10平方米的小客厅。厅里被半旧的布面沙发、电视柜等什物塞得满满的。

对我们的采访意图，尉凤英没有什么反感，但显然对蒋少武带去的老照片更感兴趣。她拿起一副老花眼镜，却因缺腿没戴上，索性操起放大镜一张一张照着仔细看。

“这张照片上的人都在干什么呢？”她对那张许多人一起左手叉腰，右手拿语录本在胸前的照片半天想不出所以然，蒋老师帮她回忆说：那是到万人坑参观，在火车上跳忠字舞呢！你忘了吗？那时候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仪式，一天得跳好几遍舞呢？”

她想起来了“对，是跳舞呢！那时我多瘦，多年轻。你说，有那些时间学点技术，啊？为国家多填补几项空白多好！那时候，我每天穿着工作服，兜里揣着‘十六条’，骑一辆旧车子到处宣传，家都顾不上。冬天刚把被子拆了泡上，没等洗呢，来通知出差，闹得老伴和孩子晚上盖棉花套子。”那语气里有太多的自责。

“我姥姥那时可真是一心一意干革命啊！”她17岁的外孙女似懂非懂的伏在姥姥身上说。“那时不光姥姥，都一样。”她边说边让外孙女去给她弄水喝，并嘱咐“就要凉水，越凉越好！”可能是出去接我们走热了，一大碗凉水“咕咚”、“咕咚”几下就喝进去了。这一毫无造作的“豪饮”，让人悟出一个真实的尉凤英：无论岁月曾给过她什么，在她身上留下的，只有朴实无华工人的本色不变。

“看看，这张，啊？正喊呢！文化大革命就是喊呐！”尉凤英看着自己穿的补布丁裤子说。“是好裤子不穿，特意是吧？”一个亲戚开着玩笑。她马上认真认真地说：“那可不是。那时家里人口多，三个老人加孩子，工资低。”尉凤英的工资到1982年才从74.88元涨到100多元。现在月工资300多元，乱七八糟放一块500多元，和老伴的加一起不到1000元。她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平时以吃粗粮为主。身上穿的半袖白衫是她10年前自己做的，她说“它也

不坏呀！”前一阵子为了参加市里的一个会，才现到五爱市场去花 20 元买块布自己做了条新裤子。

她说，她也有一些老照片，想请蒋老师帮忙翻拍复制，说着就起来，蹒跚着到各个房间拖出大大小小的皮箱，翻出一大堆老照片和各个时期模范、先进的证书、奖状来。她特别钟爱的是金日成授予她的那套“一级勋章”，说戴着它上朝鲜可以享受免费待遇，但她从未尝试过。她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们有笃深的感情，珍藏了许多他们的老照片和像章。我要借她年轻时的照片一用，她坚定的回绝。后来还是蒋老师的面子，同意让蒋老师拿着翻拍复制，说复制后的照片可以用。她说：“我相信他（指蒋老师）。我相信他，不过你也别生气。”我自然非常理解人到老年对老照片的珍视，人之常情，尤其是在历经许多坎坷后，她对陌生人的防范大约不仅是一种本能，更是一种经验。

照片可以复制，生命却不可以重复。65 岁的尉凤英面对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回忆中有着无限感慨。

她曾经走上高位，高处不胜寒

政治曾不经意的“拥抱”了她，她与政治却那么陌生、遥远。她对自己曾有过的“辉煌”看得很淡。她说，她从来就不是往上“爬”的人，只是怀着报恩的思想拼命为党工作，为国家创造出巨大财富；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三次作人工流产，其中有一个是男孩。为此，党和国家授予她“全国劳动模范”和“毛主席的好工人”等光荣称号。至于后来沉浮于政治，她认为完全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

对“文革”期间派系斗争，她现在觉得象“游戏”一样，耽误了国家建设。她动情地回忆道：“那一年，辽宁三大派的代表到北京谈判大联合，谈了8个月僵持不下，周总理亲自做工作启发教育，从南昌起义开始，一讲就是5个小时，饿了大家一块吃饼干；天冷了，总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大棉袄，苦口婆心呐。那年组织上要我出访阿尔巴尼亚，因谈判也没去上。那时候多糊涂啊！谁对？谁错？我们都错了！”

她接着回忆说“本来，许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凭着忠于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判断是非。那是1970年吧，组织上通知我们去开会，上哪儿去开什么会都没告诉。一下飞机，好家伙季节都变了，沈阳是秋天，这里却春天一样，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庐山，党要在这开九届二中全会。毛主席让我们这些工农代表先放几天假，玩一玩，然后就开会了。讨论会上，毛主席说，国家主席要经常出国，耽误工作，他就不当了。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同意！可第二天，就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我们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自己不当是一回事，别人反对毛主席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我们表示要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谁反对就打倒谁。现在看，政治斗争的实质我们并不了解，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

她坦言，她是工人，尽管她有时离领袖们很近，但工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心路历程毕竟距离太远。她曾经被历史的烟云托得高高，托得高高不见得没有与云共舞的烦恼；也曾在瞬间跌入谷底，跌入谷底不见得没有与水同流的欢乐。

尉凤英在身居高位时，除举手表决一些国家大事外，在省里主要工作是下去搞调查研究，她说她是个实打实着的人，对一些浮夸虚报的事情看不惯没少顶。那些年她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里过的，都是在矿井下、高炉旁或地震棚、灾区等度过的。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了。

她以不变的品格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也感知外面的世界

尉凤英是一幅老画，你可以观赏并从中受到某种启迪，但你不要企图改变她。她信仰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很执着。她说“毛主席是伟大的。至于‘文革’期间，那就像一个司机把握方向盘，偶尔偏了一点。”尽管她对伟人博大的襟怀不甚了了，但她不能忘记伟人对她的关怀，是伟人的光辉照耀了她，才使她的生命之花“灿烂”夺目。1976年伟人长逝，她为他守灵。

在她身上一个老党员、老模范的品格没变。她总是先人后己，为别人着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因此，她就有许多朋友。她说：“人不能孤独地活。”去年，她骑车到市场买菜，被飞驶的摩托车撞翻，当时就昏了过去。可当人们救醒她，看到闯祸的小伙吓的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忍着伤痛告诉人家“没事了，你走吧。”本来小伙以为非被老太太讹一笔不可，没想到会是这样。后来听说自己撞的是老劳模，内心被老人的高贵品格深深打动，主动去医院看望尉凤英。她是豁达、宽容的。对伤害过、误解过她的人她都谅解了。

她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也关注外面的世界。她对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很反感。比如个体商贩的缺斤少两、个别企业的仿伪造假等等。她说“怎么自己人骗起自己人来了？还有没有一点民族感？”

她认为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很务实。市里领导对她也很关心。问到她对下岗怎么看，她说：“那是前进中的问题，会好的。”

如果说她身上有那些改变，不如说是一种完善。每天除去买菜、读报、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外，种花、养鸟这些“闲情逸致”，就成为她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家的后院养了30余种花，光是牡丹就有草、木本两种，20余株，藤藤蔓蔓，枝枝叶叶，像个袖珍植物园。她把房前屋后的地开辟出来，从春天开始，一茬接一茬地种白菜、茄子、黄瓜、豆角、西红柿……；她每天到这里浇水、上肥，还搞嫁接，家里餐桌上常有她亲手种的新鲜菜。这个曾将光和热奉献给祖国与人民的老劳模安享着宁静的晚年。

有一天，她精心地到园子里采了两枝月季花，说是晚上到医院看老伴时带去。她和老伴恋爱结婚，相濡以沫40余载，感情深厚。她忘不了1961年自然灾害闹饥荒，她到北京开“群英会”，因甲状腺瘤在北京协和医院手术，老伴从沈阳赶去看她，带给她好不容易弄到的两小穗苞米；她忘不了，老伴回沈后就开始到外面捡菜帮子挖野菜吃，把自己的定量粮攒下小半袋子给她。她说：那可是两口子为争一碗饭都有闹离婚的时候呀。”像这样的“忘不了”尉凤英还有很多。因此，有两次“革命”需要她离婚时，她断然拒绝，她说只有这件事不能听组织的。

观礼归来，尉凤英三感

杨中旭

赴京参加国庆 50 周年庆典归来后，年已 66 岁的尉凤英谈起了作为辽宁劳模代表团成员，赴京参加国庆 50 周年观礼的感受。

感受之一：“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这句感慨是尉凤英在慢慢回忆起参加过多次国庆观礼后发出的。她从 1955 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以来，已至少十几次赴京参加国庆庆典。这次赴京的辽宁劳动模范代表团只有 6 人，都是建国以来辽宁大地上涌现出的各领一代风骚的杰出人物，尉凤英是其中之一。她 1990 年、1994 年和 1999 年 3 次国庆活动中均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江总书记今年 8 月视察辽宁时，尉凤英又一次有幸受到江总书记的接见。这位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前后 13 次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深感倍受鼓舞。

感受之二：“北京真漂亮！”

这句概括是尉凤英阔别首都 5 年后发出的，她上一次去北京是 1994 年。“马路边都是花，红旗招展，大路宽敞，建筑也新，夜景更美，真令人兴奋。”“9 月 29 日，我同

全国百名劳动模范游览了北京，看到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国家建设的变化之大。”尉凤英说：“北京正向世界一流大都市迈进，我衷心地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感受之三：“国庆阅兵真长自己的志气！”

这句感慨是尉凤英观看了国庆阅兵与群众游行后发出的，她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下西侧 5 号观礼台观看了 2 小时零 5 分钟之久。

“十·一”那天早晨，尉凤英 4 点半就醒了，激动得实在睡不着。从威武庄严的国旗护卫队正步走向升旗地点时开始，到 17 个陆、海、空三军以及预备役、民兵方队走过天安门，尉凤英一直站着看，而且观礼台上的劳模也都舍不得坐下！“咱中国真了不起，看了阅兵式真长志气，真的走向世界了。咱的队伍走的刷齐啊，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强大。”

和雷锋在一起的日子里

薛三元

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其事迹被广为传诵，名字家喻户晓。战友怀念他、社会需要他、时代呼唤他。我与雷锋在一起战斗和生活了两年，虽然岁月冲刷掉了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但雷锋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

我和雷锋相识是在1960年1月8日，也正是雷锋参军入伍到部队的那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运输连与全团官兵一道，冒着严寒敲锣打鼓地到营口火车站迎接新兵。在离火车站不远的部队训练场上为新兵举行了欢迎大会。在会上吴海山团长首先讲话，接着老战友代表讲话，讲完以后就听见主持会议的团政治部张主任说：“下面请新兵代表雷锋讲话，请大家欢迎！”这时只见一个个头不高、穿着有些肥大军棉衣的新兵从队列中不慌不忙地走向主席台。上台后向团首长敬了个礼，又转身向大家敬了一个举手礼，然后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就大声念了起来。当时风很大，他拿的稿纸被风刮得直翻页，读起来不方便。就见他把稿纸收起来继续发言，讲述了他参军